

对外传播话语翻译抉择的“关键之处”： 批评翻译学的实证路径探索^①

王斌华 香港理工大学

摘要：本文在对翻译学发展路径进行回顾和前瞻的基础上，分析了批评翻译学的来龙去脉，明确了批评翻译学路径在揭示翻译活动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互动关系中的作用。本文提出，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理论的视角，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剖析译者翻译抉择的“关键之处”，可作为批评翻译学实证研究路径的突破口。作为实证研究的案例，本文介绍了一项关于中国对外传播政治话语翻译“立场表达”的研究，展示了基于语料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主题词：批评翻译学；实证研究路径；翻译中的评价；翻译抉择的“关键之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15)01-0101-07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5.01.014

1 背景：国际传播话语和批评翻译学

在现代社会的国际传播和政治、外交、商务、文化等各种国际交往中，翻译（包括口译和笔译，下同）活动无处不在。然而，在公众的视野中，译者仍然是国际传播和交往话语背后“不为人知的中介”（unknown agents）（Schäffner, 2012），翻译在全球信息流的生产和流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基本上被公众所忽视，并由此而产生一种错觉，即，信息在不同语言社群和不同文化之间流通时，能够保持毫不走样（Bielsa, 2009: 14）。现代社会

中传播和交往媒介的全球化趋势不但没有消除这种错觉及凸显翻译在其中的角色，反而加深了这种错觉：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翻译职业规范所规定的译者隐身性和翻译技术工具进步所带来的便利性使得人们更容易忽视翻译在国际传播和交往中的作用，诚如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开幕式上“国际译联”（FIT）播放的一段影片所显示的那样，只有当翻译不在场或者出问题

作者简介：王斌华，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言学系助理教授（研究）。研究方向：口译研究、翻译研究。E-mail: wangbinhua@hotmail.com。

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过程中的各种复杂性,并遮蔽了翻译活动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 (Bielsa & Bassnett, 2009: 18)。

具体而言,公众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不足主要体现在:(1)人们往往认为,翻译仅仅是一种在语际之间寻找语义对等的活动,而这样一种语义匹配的活动是程式化的、无需鉴别的;(2)虽然翻译活动的语境受制于各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和价值选择,但翻译的意义生成和意义协商过程是能够并且应该产生一成不变的结果的;(3)作为上述两点的结果,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介和参与角色在公众认识中亦得不到承认 (Pérez-González, 2012: 172)。

就译界本身来看,经常有人提出,语言转换和语言学路径的研究才是翻译学的本体。这一看法有点跟不上译界的实际发展。任何一位翻译界的实践者都能体会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做好语言转换只是达到了翻译质量标准的基本要求而已。作为译学研究者,如果我们关注的仅仅是翻译中的语言转换,那么我们对译学研究对象的考察就不够完全、不够充分,因为译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还包括译者(和作者)、翻译活动的语境、社会文化背景、翻译活动的功能和作用等等。由此看来,关注语言转换的语言学路径的研究是译学研究的本体,关注译者角色、翻译语境、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翻译的功能和作用的文化学路径和社会学路径的研究也是译学研究的本体。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译学研究仅仅关注语言转换这一“本体”,实际上是画地为牢,使翻译研究的意义大为降低,而这也是造成公众对翻译活动和译学研究的价值认识不足的一个原因。

从翻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翻译学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化转向”后,其学科地位基本确立,研究视域也大大拓宽,在描写翻译研究的视域中体现为以翻译规范描写为核心的研究,在功能翻译理论的视域中体现为以目的论为核心的研究。从翻译研究的关注对象来看,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以源语文本为中心的忠实度考察,而是充分考察目标语文本;摆脱了以作者为中心的窠臼,更注重探究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作用;不仅考察翻译文本,而且考察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语境

及其功能和作用。近年来,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方兴未艾,不少学者提出译学研究的“社会学转向”(Wolf, 2006; Pöchhacker, 2009; Angelelli, 2012)。相关学者指出,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转换和跨文化交际的协调(mediation)行为,而且是一种社会情境中的活动(socially-situated activities),是一种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协调活动(socio-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mediation) (Inghilleri, 2003)。基于这种认识,国际译学界著名学者Mona Baker进一步提出,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索翻译这一话语活动和其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她认为,口译员和笔译者所协调的翻译过程像社会中的其他互动行为一样,也是受到权力关系制约的,故此,视翻译的语境化过程为一种动态的协商过程来加以考察,能使译学研究中的批评更富有成效 (Baker, 2006: 322)。

在新闻文本和政治文本等对外传播话语的翻译中,我们可以发现,翻译的用词、表达、语气、语篇模式等方面并不只是与语言及文化因素有关,还取决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尤其是包含于其中的权力关系因素,包括政治权力、族群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等。在国际传播中,翻译是政治语言话语策略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如Schäffner (2004)指出,翻译能实现“高压、抵制、掩饰、合法化(或非法化)”[coercion, resistance, dissimulation and (de)legitimation]等政治语言的话语策略功能。

举例来说,近期国际媒体传播中一个世人瞩目的事件是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称载有239人的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MH370航班与管制中心失去联系,马来西亚启动了搜救和联络机制寻找该飞机,先后联合25个国家参与搜救行动。其间,马航和马来西亚政府召开了数场新闻发布会发布相关消息,直至3月24日晚10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MH370航班“终结”于南印度洋(原文:“...flight MH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家代表性中文媒体(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对这场发布会的电视直播中,同声传译均把发布会的这一结论性句子中的“ended”译为“坠毁”,两台的电

视画面显示的快讯字幕也用了“坠毁”一词。各大新闻门户网站关于这场发布会的报道和评论显示,中文媒体普遍抱怨马来西亚总理不应该仅凭英国“国际海信卫星组织”(Inmarsat)对一些数据的估算结果以及在多国搜救尚未结束之时就草率、匆忙地发布“坠毁”的结论。此类抱怨的声音亦传到了马来西亚政府那里,以至于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希沙姆丁在4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澄清:马来西亚总理从未下结论说航班已经“坠毁”(crashed)。显然,马来西亚总理新闻发布中用“ended”一词,是采用了模糊的话语策略,译员译为“坠毁”,虽然是符合逻辑的翻译抉择,却未能考虑到政治人物使用这一词的话语策略。如此看来,媒体传播翻译中的一词之差,并非无关紧要,尤其是关键字眼。

那么,在翻译研究中如何揭示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中所隐含的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学者(胡开宝,2014)提出“批评翻译学”(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的研究路径,即借鉴批评性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文本的接受、翻译文本语言特征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分析,揭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隐性的方式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以隐性的方式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批评翻译学的路径本质上是描写翻译研究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三者均关注文本在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生产和接受,均强调文本特征应与文本的生产和接受过程和语境联系起来,探讨文本生产和接受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胡开宝,2014)。下文将探讨批评翻译学的实证研究路径。

2 翻译中的评价——译者翻译抉择的“关键之处”

翻译是译者对源语文本在目标语中多种可能的表达进行综合评价并最终做出抉择(decision-making)的过程,翻译是一个连续的评价(evaluation)过程(Munday,2012)。所谓“评价”,指的是“讲话者或写作者对于其所谈或所写的事物或命题的立

场、观点或感情色彩的表达”(Hunston & Thompson,2000:5)。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因语篇和语境不同而体现出译者在翻译抉择过程中对评价意义的不同转换方式,从而产生翻译的不确定性和译者主体性。换言之,翻译中的评价就是文本中体现出来的译者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立场,任何译文都体现译者的评价,即译者主体性。翻译研究的文化学路径虽然将翻译看作一种译者介入(intervention)的过程,关注翻译和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但其实证研究实际上主要依赖的是文本外(extratextual)的数据,如译者的译本前言、后记等(Toury,1995:65),对文本语言的评价性研究不够,因此未能真正有效地揭示翻译文本和翻译中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之间的联系。有鉴于此,译学界代表人物Jeremy Munday在其新著《翻译中的评价:译者抉择的关键之处》中指出:“评价性语言在许多方面恰好是沟通文本和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之间鸿沟的桥梁。”(Munday,2012:12)

Munday通过翻译中的评价性语言考察译者翻译抉择的关键之处,其理论依据和方法路径借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理论”(the Appraisal Theory)。“评价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的人际功能考察的新发展。根据Martin & White(2005)的理论,“评价理论”由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级差(graduation)三个互动的子系统组成。态度系统是评价理论的核心部分,是语言使用者通过情感(affect)、判断(judge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这三个方面对所描述对象进行评价的资源;介入系统表明语言使用者评价资源的来源,包括单言(monogloss)和多言(heterogloss),它关注语篇中所体现的人际或概念意义的协商方式;级差系统标记态度资源介入程度的分级,根据评价价值的强弱高低又分为语势(force)和聚焦(focus)(Martin & White,2005:38)。

那么,如何在实证研究中对翻译中的评价性语言进行客观而系统的考察?Munday(2012)提出以考察翻译抉择中的“关键之处”为突破口。他指出,翻译文本中总有些部分最容易受到价值观的操纵,最富有解释和评价的空间,因此这些部分“要求译者的阐释,有时还

要求译者的实质性介入”(Munday, 2012: 2)。他称这些部分为翻译抉择的“关键之处”(Critical Points), 即“翻译文本中易受价值操控的词汇特征、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翻译偏移(shift)以及其他最具阐释和评价潜力之处、最能揭示译者价值观之处”(Munday, 2012: 41)。从实证研究操作的便利性来看, 这确实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妙方法, 通过寻找翻译文本中最能体现译者的介入、评价作用以及最能体现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翻译抉择关键之处, 研究这些关键之处在翻译中呈现的规律, 来揭示译者、译本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可以系统比较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评价态度的组成部分、态度的来源和态度的强度, 可以描述翻译文本的主题词、关键词和表达态度和价值的词汇的使用特征, 亦可以对目标语文本的翻译偏移进行评价理论角度的解读, 还可以对译者的协调和介入行为进行考察。

在以往的翻译研究中, 无论是把翻译作为语言转换或认知过程来探究, 作为交际行为来考察, 还是作为社会活动来研究, 往往探索的只是其一个层面: 或是语言层面, 或是认知处理层面, 或是交际功能层面, 或是文化系统和规范层面。Munday (2012) 提出研究翻译中的评价语言的实证路径则在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和翻译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属性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的界面。而且, 这一研究路径通过分析和考察翻译行为和活动中“价值植入”(value insertion) 在语言层面的实现方式(Munday, 2012: 40), 揭示翻译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属性, 如此, 可望拓宽翻译学的研究视域, 加强研究的深度, 并提升其研究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研究翻译抉择的“关键之处”堪为批评翻译学一条可行的实证研究路径。

3 批评翻译学实证研究的案例分析

运用Munday (2012) 关于翻译中的评价语言的研究路径, 我们对一个关于中国对外传播政治话语翻译的语料库进行了实证研究(Wang & Feng, 2014), 在此简要介绍, 作为探索批评翻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案例。

本项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批评性话语

分析的方法(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通过考察该口译语料库中译员翻译抉择的“关键之处”, 揭示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过程中翻译的“立场表达”(stance-taking)。

批评性话语分析(CDA)是政治和传媒话语分析一种常用的研究路径, 其典型方法是对语篇中的关键概念和关键词进行批评性的分析(Chilton, 2004; Fairclough & Wodak, 1997; van Dijk, 1997)。虽然批评性话语分析在单语文本的分析中比较常见, 但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尚为得到广泛应用。有必要指出的是, 现代社会的翻译研究不再仅仅关注译本是否忠实于原文, 还关注翻译的社会、文化、交际属性, 关注翻译行为和翻译产品的社会、文化、政治意义, 关注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由于对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类交往活动的共同关注, 尤其是对这种活动所产生的语篇和话语的共同关注, 翻译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存在诸多跨学科互动的空间(Schäffner, 2004: 136)。鉴于本研究旨在揭示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过程中翻译的“立场表达”, 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个根本目的是“揭示语言使用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以及隐藏于其中的权力关系”(Fairclough & Wodak, 1997: 258), 因此,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适用于本研究。在这一方法的适用过程中, 我们注意到, 虽然批评性话语分析在政治和传媒话语分析中已得到广泛而有效的运用, 但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也受到了批评: 往往有些研究的数据规模偏小, 多为一个语篇或者是语篇的一部分, 如此分析得出的结果在系统性和普遍性方面都易受到质疑(Chilton, 2005)。近年逐渐发展成熟的语料库技术和方法可以弥补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一方法上的缺陷, 已有研究者尝试结合语料库分析工具和批评性话语分析, 如Baker et al (2008) 运用语料库工具对较大规模的语料进行了系统分析, 为其关于英国媒体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建立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CEIPPC双语平行口译语料库”, 该语料库包括1998—2012年15场中国总理“两会”记者会的汉英交替传译语料, 共有七位外交部翻译室译员的现场口译。关于语料的详细背景及建库过程, 请参见Wang

(2012) 和王斌华 (2012: 2013)。

语料库工具生成的高频词表显示, 本语料库中文字库前十位的高频词中, 有两个实词: “中国” (词频700)、“问题” (词频568)。“中国”一词在目标语表达中, 或对等于“China”, 或对等于“Chinese”, 故这一高频关键词的翻译基本上不存在译员协调或介入的空间。“问题”一词则不同, 根据《新华字典》, “问题”有四个义项: ①要求回答或解答的题目; ②需要解决的疑难和矛盾; ③关键, 重点; ④意外事故。因此, 在这一高频关键词的翻译中译员的阐释和介入空间很大。通过双语平行语料库工具ParaConc的“热词检索” (Hot Word List) 功能, 即检索词在目标语语料中的对应翻译, 我们发现, 目标语语料中使用的对应词包括: question (s)、problem (s)、issue (s)。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2003), 上述各词在语言使用中的含义是不同的: question指要求回答或解答的题目, 或指需要解决的疑难; problem指的是需要处理或解决的不好或是有害的事情、状况或矛盾; issue指的是需要讨论或争辩的重要议题或问题。如此看来, “问题”这一高频关键词是译员翻译抉择中的“关键之处”, 即确定为本研究的焦点。

通过语料库的“词簇” (cluster) 检索工具, 我们对“问题”一词在语料库目标语语料中的对应词逐一进行了“关键词上下文语境” (KWIC) 的检索, 发现译员在这一关键词的翻译中存在词汇选择 (lexical choice) 的规律性。译员倾向于使用issue一词来传译讲者所指涉的国际“问题”, 在此类上下文语境中, 讲者话语中往往隐含该议题或问题是可以讨论或争辩的意思。译员倾向于使用problem一词来传译讲者所指涉的国内“问题”, 意味着该类事情、状况和矛盾是可以处理或解决的; 在传译讲者所强调的重要的、严重的、复杂的或艰巨的国内“问题”时, 译员则倾向于使用issue一词。译员倾向于使用question来传译讲者所指涉的需要处理或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此类上下文语境中, 讲者往往隐含了该事情或状况不存在讨论或争议的余地, 如“台湾问题”。

在使用语料库工具对较大规模数据进行了充分描述并发现翻译抉择“关键之处”的

规律性特征之后, 我们使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评价理论视角对所发现的规律进行了阐释 (interpretation), 提出了翻译活动中“立场表达”的阐释性框架。所谓“立场表达”, 指的是讲话者或写作者的态度、评价和判断意义的表达 (Englebretson, 2007)。根据这一阐释框架, 对外传播政治话语翻译的“立场表达”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态度” (attitude), 即译员所选择词语的感情色彩和态度含义是积极还是消极; 第二个方面是“介入程度” (engagement), 即译员所选择的词语意味着扩展还是缩小了对话的空间 (dialogically expansive or contractive); 第三个方面是“参与程度” (commitment), 即译员选择的词语所显示的对话题的关注程度。

在描述和阐释之后, 我们试着对研究发现进行了解释 (explanation)。我们认为, 对外传播政治话语翻译人员立场表达的主要动因可归因于他们的机构“口译规范” (王斌华, 2013)。作为政府的机构译员, 他们是政府的“喉舌” (spokespersons), 他们在翻译行为和活动中的立场表达与代表政府的发言人保持一致 (alignment)。这一解释亦可从机构译员发表的关于其翻译活动的总结回顾文献中得到印证。例如, 关于中国对外传播政治话语的翻译, 多位机构译者均在其文章中指出: “中国大陆”应译为China's Mainland, 而不应译为Mainland China (徐亚男, 2000; 过家鼎, 2002; 施燕华, 2007); “台湾问题”应译为Taiwan question, 而不是Taiwan issue (过家鼎, 2002)。

如上所示, 本研究案例在研究步骤上借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逻辑, 即: 从描述到阐释, 再到解释 (Description — Interpretation — Explanation) (黄国文, 2004)。通过语料库方法的运用, 描述的结果建立在对较大规模数据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 阐释分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框架, 动因解释亦得到了文本外数据的印证。

4 结语

本文在对翻译学发展路径进行回顾和前瞻的基础上, 分析了批评翻译学的来龙去脉。本

文提出,通过考察翻译中的评价语言剖析译者翻译抉择的“关键之处”,可作为批评翻译学实证研究的突破口。作为实证研究的案例,本文介绍了一项关于中国对外传播政治话语翻译“立场表达”的研究,展示了基于语料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注释

① 本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GRF项目的资助(项目编号:4-ZZDG),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Angelelli, C. Introduction. 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2,7 (2): 125-128.
- [2] Baker, M. Contextualization in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mediated event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6,38: 321-337.
- [3] Baker, P. et al. A useful methodological synergy? Combin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to examine discourses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the UK pres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08, 19 (3): 273-305.
- [4] Bielsa, E. & Bassnett, S. *Translation in Global News*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5] Bielsa, E.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ranslation: An introduction [A]. In Esperanza Bielsa & Christopher W. Hughes (eds.)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ranslation* [C].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1-21.
- [6] Chilton, P.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7] Chilton, P. Missing links in mainstream CDA: Modules, blends and the critical instinct [A]. In Wodak, Ruth & Paul Chilton (eds.) *A New Agenda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5.
- [8] Englebretson, R. (ed.) *Stance-taking in Interaction: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
- [9] Fairclough, N. &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T.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Discourse Studies 2: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C]. London: Sage, 1997: 258-284.
- [10]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hristian, M. I. 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M]. London: Arnold, 2004.
- [11] Hunston, S. & Thompson, G. (eds.) *Evaluation in Text: Authorial 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C]. Oxford: OUP, 2000.
- [12] Inghilleri, M. Habitus, field and discourse: Interpreting as a socially situated activity [J]. *Target*, 2003, 15 (2): 243-268.
- [13] Martin, J. R. & White, P. R.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M]. 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14] Munday, J. *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 Critical Points of Translator Decision-making*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15] Pérez-González, L.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and the genealogy of conflict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012, 11 (2): 169-184.
- [16] Pöchhacker, Franz. The turns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A]. In Gyde Hansen, Andrew Chesterman & Heidrun Gerzymisch-Arbogast (eds.) *Efforts and Models in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Research. A Tribute to Daniel Gil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9: 25-46.
- [17] Schäffner, Christina.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anslation studies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004, 3 (1): 117-50.
- [18] Schäffner, Christina. Unknown agents in translated political discourse [J]. *Target*, 2012, 24 (1): 103-125.
- [19]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 [20] van Dijk, Tuen. What is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Blommaert, Jan & Chris Bulcaen (eds.) *Political Linguistic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7: 11-52.
- [21] Wang, Binhua. A descriptive study of norms in interpreting: Based on the Chinese-English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Corpus of Chinese Premier Press Conferences [J]. *Meta*, 2012, 57 (1): 198-212.

(下转111页)

I/O大会上披露, 该公司旗下的谷歌翻译平台现每天为2亿用户提供10亿次翻译服务。数字时代使得翻译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翻译也使数字时代成为可能。我们已经无法摆脱数字时代对于传统翻译的冲击, 就不如拿起数字工具主动营造一个翻译的数字时代, 或者说一个数字的翻译时代。□

注释

- ① 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金项目(项目号: 12YJA880041)和2013年广东省高校人文科研项目(项目号: 2012WYXM_0013)。

(上接106页)

- [22] Wang, Binhua & Feng, William. 'When Chinese Leaders Speak English through the Interpreter' — A Corpus-based Study of Interpreted Political Discourse from China [Z]. Plenary keynote speech at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May 23-25, 2014.
- [23] Wolf, Michaela. (ed.) *Übersetzen — Translating — Traduire: Towards a "Social Turn"?* [C]. Münster/ Hamburg/ Berlin/ Wien/ London: LIT-Verlag, 2006.
- [24] 过家鼎. 注意外交用词的政治含义[J]. 中国翻译, 2002(6): 59-60.
- [25] 胡开宝. 批评翻译学研究: 内容与方法[Z]. 川外学坛“学术大视野”讲座, 2014年4月15日.
- [26] 黄国文. 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J]. 中国翻译, 2004(5): 15-19.
- [27] 施燕华. 怎样做好外交口译工作[J]. 中国翻译, 2007(3): 57-60.
- [28] 徐亚男. 外交翻译的特点以及对外交翻译的要求[J]. 中国翻译, 2000(3): 35-38.
- [29] 王斌华. 语料库口译研究: 口译研究方法的突破[J]. 中国外语, 2012(3): 95-100.
- [30] 王斌华. 口译规范的描写研究——基于现场口译较大规模语料的分析[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参考文献

- [1] 何高大. 基于Web的翻译系统评价[J]. 中国科技翻译, 2012(1) 22-25.
- [2] 何高大. 专家聚会岭南, 翻译论坛璀璨——第二届岭南翻译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农业大学召开 [J]. 中国科技翻译, 2013(3): 63-64.
- [3] 吴刚. 《电影中的翻译》导读 [A]. Cronin, M. *Translation Goes to the Mov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1.

Exploring the “Critical Points” in the Translations of Dis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 Based on a retrospection and prospection of various research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CTS), which is functional in reveal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interpreting activities and their social,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mbedding, especially in the translations of dis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CTS is conceptualized, featur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erspective of “Appraisal Theory” and the method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to the exploration of “critical points” in translation/interpreting. A case study is presented to illustrate the utilization of such an approach, which analyzed “stance-taking” in the interpreting activities of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with the method of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Key Words: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empirical approach; 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 “critical points”